

# 记我父亲

任溶溶

看我父亲的一生，可以看到解放前那一代商人的经历。

我父亲本是个农民孩子，他的父亲在柳州当账房先生，可我父亲刚出生就丧父，是他母亲即我祖母把他拉扯大的。我家乡不少人到日本谋生，把我父亲也带去了。可惜我父亲水土不服，乡人说与其死在异乡，还不如回老家。他只好回国。途经上海，同乡好心，说你回乡也难生活，就在上海谋生吧。他被收进印字馆，即印刷所。我父亲发愤用功，他会日语，又学英语，深得老板喜欢，让他当跑街。我父亲福至心灵，跟外国人交道打得很好。我父亲在外国人的赞助下，自己开木器店，供应外国邮轮家具，很赚钱，于是他又一次自己开了一家印字馆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上海与国外交通不畅，洋纸价格暴涨，我父亲就将印刷所那些纸张开纸行，他开的华兴纸行一直营业到解放。

我父亲在上海认识的广东商人多，在他们当中很吃得开。他与先施公司老板是好朋友，共同发起成立先施人寿保险公司（包括香港的一家），又与友人发起开设丽华公司。我1938年从广州来上海，父亲太开心了，马上带我到丽华公司做了两套西装。这件事遭到我母亲批评和笑话，说我在发育，这两套西装能穿几天。一点不错，这两套西装只有一套我穿过一次，是为了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。

我父亲和外国人来往多，他爱吃西餐。我和他两个人曾长期一起生活，他带我出去吃饭多是吃西餐。只有和他的朋友一起才去大三元等酒家吃粤菜。不过他也爱上五芳斋吃客饭。他说粤菜炒虾仁不过关，远不及本帮菜的炒虾仁。

过去我住在四川路北京路口的腾凤里，附近西餐多，腾凤里对面的青年会楼下就是西餐馆。四川路香港路口西侨青年会又有一家西餐馆，而且比较高级。四川路南京路口有德大西餐馆，还有吉美饭店，马尔斯饭店（后改名东海饭店），都卖西餐。我父亲教我吃西餐。可是老实说，我情愿吃广东菜，西餐没几种花样，还要动刀动叉，麻烦得很。可是我父亲喜欢。一直到晚年，他住在我这里泰兴路的家，还爱到南京西路陞西路附近的来喜西餐馆吃咖啡吃西餐，还带我的儿子去吃。

正是由于他到过日本，就爱吃饺子牛肉。据说这是日本菜。我母亲经常安排弄饺子牛肉给他吃，我也有得吃。所谓饺子牛肉，其实就是打边炉，涮牛肉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牛肉，真是热闹。当然，滚水里还放鱼滑、粉丝等，很好吃。

因为我父亲爱吃西餐，我母亲也会烧点西餐，如牛扒、煎鱼等。我母亲服侍我父亲实在周到，不会烧的菜她会请人教。我母亲是位好太太，一直细心服侍我父亲直到他去世。我父亲活到九十岁。

有朋友说起，今年是陈子展先生120周年诞辰。我一下子想起了老人家那亲切、风趣的面容和声音，如在眼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，认识了子展老先生。最早看到他，肯定是中文系研究生开学时，老教授们与我们会见的那次。那是我们那届研究生唯一的一次集体与老先生见面，一下子见到了那么多声名显赫的老学者，我们都很激动。不过，在那个会上子展先生说了点什么，或者什么也没说，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连我后来怎么去访问老先生的，具体情节现在也已忘了。但我想，一定是我去向他请教有关鲁迅或郑振铎的事吧。只记得，一开始我很拘谨，而且他的浓重的湖南话也听不大懂，但很快地他就慈眉笑目地喜欢上我了。我现在可以不谦虚地说，那是因为我发现我对鲁迅、郑振铎，对当时的文坛掌故都有所了解，觉得可以与我聊聊的缘故。而我则发现老人原来非常喜欢聊这样的话题。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，于是我后来就经常去他家。

老人是非常风趣、平易近人的。第一次去他家后没几天，就给我写来了一封信，信中竟说：“你姓陈，我老头也姓陈，咱俩连宗了吧！”我知道这是有“典故”的。据说张献忠看见一座张飞庙，就下令手下文人写好文章用于祭庙，可是那些文人写了好几篇他都不满意，最后竟自己动手写道：“你姓张，咱老子也姓张，咱俩连宗了吧！”这是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，所以我知道。还有一次，老人写信告诉我，当年他与郑振铎、周子同、周谷城几位教授不时聚会，喝喝老酒聊聊天，一天在郑先生家吃饭，郑突然说：“我们都属狗啊，我们就成立一个‘狗会’吧！”这个“狗会会长”当然非郑先生莫属了。这件有趣的逸事我后来写过文章，记得题目就叫“狗会会长和杠协主席”。因为后来

季羡林先生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说建国初他与郑振铎一起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，一路上郑先生老爱与冯友兰等先生开玩笑，争论，抬杠，甚至一本正经大讲其歪理。季先生认为就抬杠而言郑先生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境界，因此便封郑先生为“杠杠协会主席”，简称“杠协主席”。

子展老人不仅学问好，而且出道早。他跟我讲，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长沙认识了主办“自修大学”的毛泽东，并与谢觉哉、李维汉等人交往，还进入谢觉哉为社长、李达为主笔的长沙《民国日报》当记者。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遭到当局的通缉，老人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当时被悬赏三千元呢！”而我通过读书早已知道，三十年代他就追随鲁迅、田汉等人参加过进步文化活动，写过很多嬉笑怒骂的杂文。与他一谈起鲁迅，老人就非常得意地说：“鲁迅先生骂过很多人，说过很多人的坏话，但是从来没有人骂过我，相反，还说我好话，表扬过我呢！”我说：“我知道的，鲁迅说你的《正面文章反看法》写得好。”老人一听，“你居然也知道”，就更加得意了。鲁迅当时在《推背图》一文中说：“《正面文章反看法》，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。因为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，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，见过许多可怜牺牲。”老人认为鲁迅是他文章的最大知己。鲁迅正面谈到陈子展的文章，还有《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？》《吃教》《伪自

# 风趣的楚狂老人

陈福康

由书·后记》等。老人还告诉我，《鲁迅全集》里甚至还收了他的一篇文章呢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回去后就查，原来鲁迅在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中收入了“威施”的《钱基博之鲁迅论》，我并查实了威施确实是老人的笔名，语出《诗经》，是驼背的意思。威施是谁，连鲁迅当年都不知道，现在的读者当然更不知道。十多年前，我参加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修订编辑工作，正好负责《准风月谈》注释的修订，就补充了一条注释：“威施，即陈子展。”不料后来却不知被哪个编辑删去了。

老人的风趣和嬉笑怒骂，至少在鲁迅的年代就已如此。他当时只有三十来岁，就以驼背老人自喻，并且还取了一个笔名叫“楚狂老人”。老人是长沙人，长沙乃古楚之地，“楚狂”则出于《论语》，是一个敢于藐视“圣人”的奇人。李白名句曰：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。”老人取这样一个笔名，反映了他放达不羁和反抗、抨击旧社会的精神风貌。

我从复旦毕业后，有一次去老人家，老人正在医院疗养，他儿子志申先生接待我。偶然间，我在书架上看到一份纸质发黄的三十年代的剪报，是老人的一篇《齐木匠的诗》，写的是齐白石大师。齐大师也是湖南人，而且确实是木匠出身，但一个未识面的青年（须知，白石大师比陈子展要年长三十五岁呢！）这样径称大师为“齐木匠”，是不是太唐突了呢？而且文章

辛辣地批评了齐白石请“封建遗老”樊樊山选定其诗集，认为“不能不说是他的诗画也蒙上了一点自命大夫君子的俗恶，好像蝇粪玷了白玉一般”。我不知道大师读了有没有生气，尤其是其中“蝇粪玷了白玉”还使我联想到大师的名号“白石”。但志申先生告诉我，大师非但没有生气，还对这位乡梓后生的直言言论十分赞赏，后来还特意刻了印章送给他呢。志申先生还找出了这方极其珍贵的印章，我当时打印了好几份，可惜现在找不到了。更可惜的，是我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（1927-1937）·杂文卷》时，没有选人这么一篇深刻、风趣的文章。

我复旦毕业后去出版社工作，曾经编选过两本书，与子展老人有关。一部是当时刚成立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请我编的《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》。我知道老人也写过像鲁迅《故事新编》那样的小说，但一般读者都不知道，就去问他，他就提供了原件。另一部，就是上面提到的上海文艺出版社（我当时工作单位）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（1927-1937）·杂文卷》。我当时整天泡在旧报刊中，由于知道老人的很多笔名，所以看到了很多老人的杂文。我把其中精彩的文章给我一起编选的郝铭鉴兄看，他也拍手喝彩，于是我们就把子展老人定位于鲁迅之下最优秀的杂文大家之列。据我所知，在我们这部书之前极少有这样定位的。当时我还多次去老人家，老人提供了很多他保存的剪报，

可惜那篇《齐木匠的诗》当时他没有找出来。

老人后来经常住院。一次，我去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看他，他见到我很高兴和亲热，大声说：“福康，你是最了解我的革命经历和写作经历的啊！”我略有点意外，他此前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啊。我是通过看书和与老人的交流，了解了一点他的经历，但决谈不上“最了解”。这不是老人向我委婉地表达，希望我为他写点什么研究文章啊？我曾经写过几篇小文章谈到老人，正经的论文还确实没有写过。于是后来我就很认真地写了一篇论文《楚狂老人的风歌——论陈子展的杂文创作》，投给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》，遗憾的是等到1990年该刊发表时，这位楚狂老人几个月前刚刚去世，我没法送给他看了。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

# 幽香刚节诗薪传

——忆与卢坤峰先生的交谊

徐建融

“君子其来，竹有清芬吐馥；先生既往，花无颜色鸟暗声。”这是我清明晨起，惊悉卢坤峰先生去世消息后立即书写的一副挽联，表达了我对卢先生一生艺术成就的心赏意会，同时也勾起了我与卢先生三十五年交谊的记忆。

卢先生以兰竹驰誉当代画坛，花鸟亦佳。他以真功实能作水墨清淡，整整斜斜，得形神兼备、物我交融之致。他一代的画家，在“新中国画”的创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有不少，但在传统文脉的传承方面能有所成就的实在是非常稀有，卢先生正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由他主笔，方增先、姚耕云点景的《毛竹丰收》轰动大江南北，一时《橘子丰收》之类风漫画坛，唐云先生的青眼却独许于渠。后来更知名，早在他的学生时代，浙江画坛的潘天寿、吴茀之等宿儒便对他格外看好，寄予厚望。而陆俨少先生评他的画品，许为“处子淑女”，令观者不敢轻读。这个“处子淑女”是谁呢？我曾戏答卢先生，以为是苏轼《水龙吟》中的“赠赵晦之吹笛侍儿”：“楚山修竹如云，异材秀出林表……为使君洗尽，蛮风瘴雨，作霜天晓。”词画相映，如镜照影，不正是同一个秋水伊人吗？

水墨兰竹，本是传统绘画中的清品第一。但正如苏轼所言，越是“非高人逸才”不能为的画品，越是便于为“欺世取名者”所摹托。所谓“播下的是龙种，孵出的是跳蚤”，后世的附庸风雅者，无不“胸中逸气”而竟效“草草逸笔”，遂使它竟成了天下伪品无双！宋人真德秀有云：“子猷行不副名，见谓污浊。子猷固爱此君，政恐此君不爱子猷耳。”而近世既爱此

君又能为此君所爱的，唐云先生之后，则首推卢坤峰了。我所撰挽联的上句，便是就此而言。

老友郑重兄想必也是受唐先生的推许所影响吧，很早就求得了卢坤峰的一幅兰竹，约有五六方尺，湘烟楚雨，月明风颭，画得十分精到。后来装裱成轴，还请我长题了裱边。2002年，我搬迁新居，朋友们来祝贺，郑、卢邻座而坐。我以为两人是旧相识，所以没有特为作介绍，却看着他们似乎无话可谈，不由发问，才知道他们原来是第一次见面，那幅画为写信求到的！一座绝倒。

我与卢先生的相识，是在1982年考入浙江美院之后。初次到他景云村的蜗居拜访之后，便成莫逆，我视卢先生为师，卢先生却视我为友。他第一本《八开本豪华版的《卢坤峰兰竹谱》出版，便请陆俨少先生题跋，而命我作序。当时，像他这一辈的画家还没有出版社为之出8开画册待遇的，这样一桩艺术人生的大事，他何幸而遇到了，又竟然让一个刚刚入学的研究生为序，一时引起不少人的惊讶。孔仲起先生还专门找到我，说：“老卢的胸中可是一肚皮墨水，眼界之高，百无一可。他能请你作序，你一定不简单啊！”我赶忙分辩：“不是卢先生‘请’我，是卢先生提携我而已，实在惭愧惶恐得很。”而孔先生也锦上添花地“求”我为他的一本画册写了一篇。从此之后，我为前辈的翰墨文字撰序，便一发而不可收了。

说到卢先生的“一肚皮墨水”，人们熟知的是他的诗词。一部《林茶卢诗草》，使季羡林先生也为之击节三叹。其实，卢先生胸中的墨水何止诗词，更在经史。他出生孔孟故里，心志所在，自与江南文人有别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便以稿费所得，购置了一橱《二十四史》，勤读不辍。据我所知，当时书画界而坐拥一橱《二十四史》的，仅谢稚柳先生和他二人。而说到诗词，在他的周围还有几位不得不提。一位是他的夫人卢师母。卢先生的诗词多为题画诗，卢师母的诗词题材则更为广阔，是真正的诗词。委婉娟静，清丽雅隽，几可雁行朱淑真、李清照。另一位是他的同学、同时又是最佳拍档的金鉴才，学生时代便被称为“秀才”，直到后来，卢先生都是这样称呼他的。金老师一生致力于践行并推广潘天寿“三绝四全”的艺术主张，又富于社会活动的热情和能力，今天浙江书画界一批坚信传统的年轻人，包括近年调进上海而大展身手的张索，便都是受到他的熏陶。此外还有他的另一个同学俞建华和夏承焘先生的学生吴战垒，在“天之将丧斯文”的形势下志道弘毅，当仁不让，共同构成了一个为“文为画之极”作承前启后的中坚。

当时正值反传统的新潮汹涌澎湃，所以，我与卢先生的交往几乎三天两

头，于“今人多不弹”的古调聊作“吾道不孤”的自我慰藉和自信坚定。进入90年代后，新潮退潮，传统才有所起色，读传统也开始流行了起来。卢先生的又一本大型画册将出版，他特地从杭州赶到上海，要我写一篇5000字左右的文言。序成交卷，其中有一句论到传统热中所遮蔽着的问题，在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。卢先生引为知音，以为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，反传统不可能真正打败传统，而谬论的“弘扬传统”却可能最终败坏传统。当晚设宴，陪座有卢师母、吴战垒夫妇和我在浙美正读研究生的学生张春记。席间，吴老师说：“真正懂传统的实在没有几个。”卢先生会心一笑，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句脱口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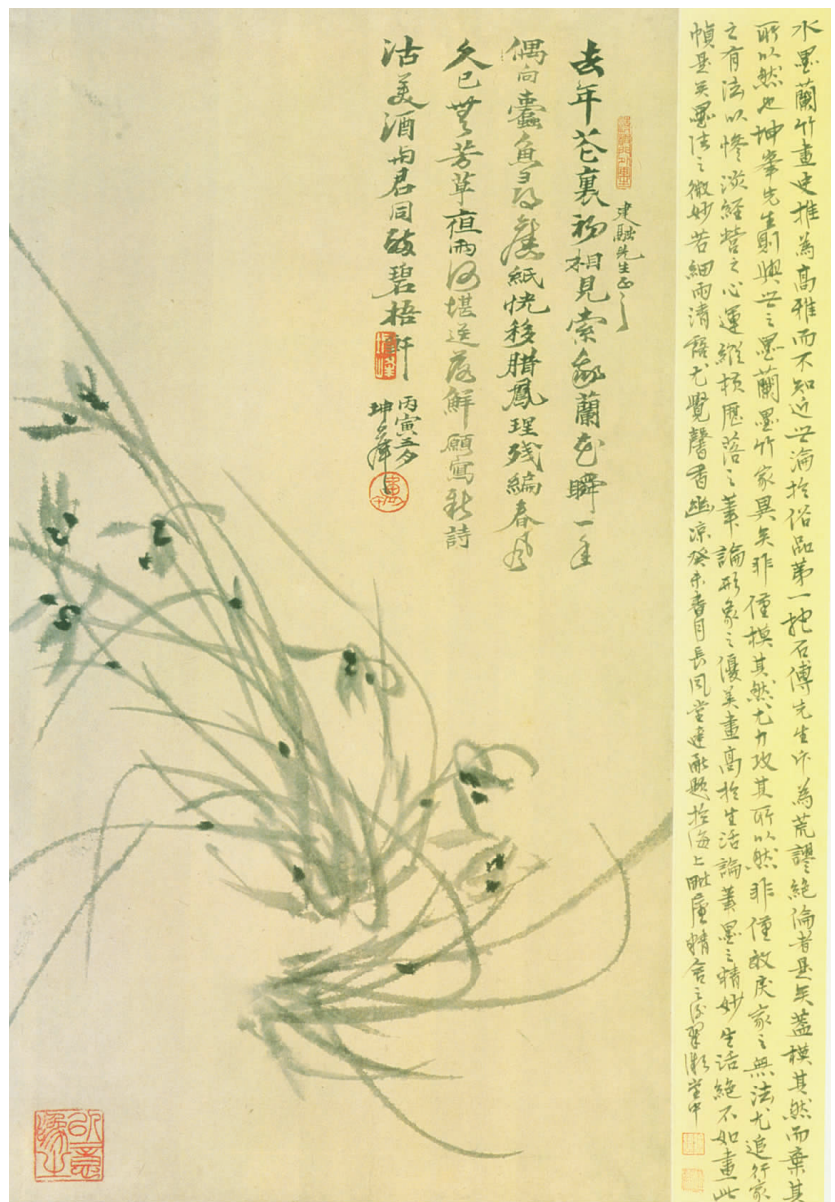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段时间，我每年必到杭州一二次看望师友，卢先生则必专程陪同整整一天。两个人找一个幽静处，品茗小酌，论画谈艺。有一次是在西湖郭庄的水榭，秋风乍起，依然满目青葱，波光云影，平淡中涌动磊落。鸟声啾啾中，卢先生吟出辛稼轩的“绿柳听莺啼”，我紧接着吟了“更那堪、鹧鸪声住，杜鹃声切”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直到“谁共我，醉明月”，戛然而止，相对无言。只觉得衣冠俱雪、啼血相照，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也是无须道的了。其温柔豪迈如此。

还有一次，永康的徐小飞置业杭城。他以贾业而儒行，也是专攻兰竹的，画蒲华的一路酣畅淋漓，较之专业的画家毫无逊色。他不仅在浙美进修时听过卢先生的课，还是卢先生掌门的浙江花鸟画协会创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，也是金鉴才的好朋友。他向我谈起卢先生，敬仰之余，感叹说：“卢先生这个人实在太清高了，很难亲近。”我打电话给卢先生，说是“我到杭州了。你们协会的徐小飞想请你吃饭……”卢先生当即应允，餐后还一起到小飞兄的府上评他的近作，相处甚欢。其高冷热情又如此。

大约十年前，卢先生因冠心病而装了支架。本来就疏于应酬的他，此后就更少出门了，朋友们戏称他开始“闭关修禅”。而我与他的联系，也改为与他的公子卢勇相交接。2012年，金鉴才为他办了一个大型的画展，一片水墨清华，功力猛晋。2014年，中国美院又为他办了一个早年墨竹、墨兰谱新编重版的展事，再次引起轰动，我的几个学生后来还把它引到了上海。

无色胜于有色，无声胜于有声。这是传统花鸟画足以“粉饰大化，文明天下，观众目而协和气”的文脉所在。如今，卢先生既已归去，薪尽火传，这一文脉也就只能期望着后来者的承继接续、发扬光大了。我所撰挽联的下句，便是就此而言。

斯人虽往，斯文未衰。呜呼先生，后已不已，已于斯。



水墨兰花 (国画) 卢坤峰

# 说“五行缺土”

顾农

“八字”；又认为它们在五行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中各有所属，如甲乙寅卯属木，丙丁巳午属火等等，如果八个字能包括五者，就是五行俱全。“五行缺土”，就是这八个字中没有属土的字，需用土或土作偏旁的字取名等办法来弥补。

世界上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这“五行”，相生相克，关系到人体健康，甚至还影响天时政事，古代且有所谓“五德终始”之说，意义非常重大。当然，天干地支现在基本只用于记年，例

如今年是戊戌年，生的孩子属狗。至于月、日、时，如何用于支来记，一般人已经不大去管了。青年人订结婚婚，也很少再有事先问明八字，进行资格审查，看是否相合的，这应当算是体现了历史的进步。

世界上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这“五行”，相生相克，关系到人体健康，甚至还影响天时政事，古代且有所谓“五德终始”之说，意义非常重大。当然，天干地支现在基本只用于记年，例

人们历来相信，缺什么就得补什么。补品吃下去，效果也许并不怎么明显，而如果不补问题就会更大更多。补品就靠这种逻辑立足于古今不衰。

进补的办法丰富多彩。鲁迅小说《故乡》里有一个闰土，人们都很熟悉，他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一是闰月生的，二是“五行缺土”。缺什么补什么，名字里来一个“土”字，就把那所缺的土给补上了。但是他后来的情况还是很难：多子，饥荒，苛税，兵，匪，官绅，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。”补了个“土”字有什么用？但那时的人总相信，如果不补这个“土”，情况一定会更差。

“五行缺土”这话现在已经不大好懂，幸而《鲁迅全集》里给加了一条很详细的注释：

五行缺土 旧社会所谓算“八字”的迷信说法。即用天干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）和地支（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）相配，来记一个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，各得两个字，合为